

藏学专家张怡荪教授

黄 显 铭

中国当代著名西藏文化研究专家、语言文字学家、《藏汉大辞典》主编张怡荪，原名张煦，男，汉族，四川省蓬安县人，一八九三年农历七月二十八日，生于一个工商业兼地主家庭，他家经济比较宽裕，自己家里设有私塾。张怡荪的祖父，是一个读书人，有眼光，对下辈子孙受教育，舍得花钱，他聘请县里有名气的塾师，来他家作启蒙老师。张怡荪的《四书》、《五经》，就是在这所私塾里学习的。张怡荪幼小天资聪颖，深受他祖父宠爱，他祖父对他要求极其严格，张怡荪从私塾放学以后，晚上还要给他增加功课，讲解一篇文章，直到他能够背诵，才准他睡觉。因此张怡荪幼年时对国文就有深厚的功底。张怡荪十四岁时，他的祖父就送他到省城成都读书，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

分设中学，乃四川一所颇有名望的中学，即以后的四川省立成都石室中学，当时是四川高等学堂的附属中学，读四年，没有高、初中之分。这所中学师资水平高，而考入这所中学读书的，都是当时的佼佼者，出了不少人才，如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诗人郭沫若，著名西藏文化研究专家张怡荪，著名作家李劫人，数学家魏时珍，生物学家周太玄，历史学家蒙文通等。他们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里，都有相当的成就，知名度很高。张怡荪在分设中学学习四年，升入四川高等学堂，毕业后，于一九一五年去北

京，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一九二〇年毕业后，留北京大学任教，此后张怡荪又在北京大学国学门作研究生。

张怡荪读书用功，学习成绩优异。据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于中华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编印的《国立北京大学概略·研究所国学门》一书记载：“（甲）研究生。经本学门委员会审查合格之研究生共十六人，其已报告成绩者五人，计成绩六种：尹文子校释（罗庸）、公孙龙子注（张煦）、老子校注（张煦）、黄河变迁考（段颐）、金文编（容庚）、殷墟文字类编（商承祚）。”其中罗庸的《尹文子校释》和张煦的《公孙龙子注》两项成绩，十分优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向他们两人各颁发了伍佰银圆奖金。这伍佰银圆，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因此得奖一事，流传甚久。此处提到的张煦，便是后来编纂《藏汉大辞典》的张怡荪教授。

张老青年时代的学术活动，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二二年三月四日，梁启超先生从清华来到北京大学礼堂，作了一次关于《老子》成书年代问题的学术讲演。梁先生在演说中认为，《老子》一书有战国时期作品之嫌，并风趣地对听众说：“我今将老子提起诉讼，请各位审判。”几天之后，梁先生果真收到一份“判决书”，题目是《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问题一案判决书》，作者是当天在座听讲的张煦先生。那时候的张煦，年仅二十八岁，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但是他居然敢于批评当时早已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梁启超先生：“或则不明旧制，或则不察故书，或则不知训诂，或则不通史例，皆由立言过勇，急切杂抄，以致纰缪横生，势同流产。”而且旁征博引，条分缕析逐一批驳，洋洋洒洒达数万言。梁启超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后，并不介意作者的尖刻用语，而是深自赞许作者的才华，尽管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仍然亲自为之题识。识曰：“张君寄示此稿，考证精核，极见学者态度。其标题及组织，采用文学的方式，尤有意趣。鄙人对于此案虽未

撤回原诉，然深喜老子得此辩才无碍之律师也。”一个是少年豪气，敢于向权威挑战；一个是学者风范，热情奖掖后学。张煦的这篇文章，连同梁启超的题识，在当时的北京《晨报》^①上发表以后，学术界纷纷传为佳话^②。

张老早年研究《老子》，除《老子校注》、《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问题一案判决书》外，还有《老子考异录》一书。这些著述，颇有见地，成一家之言。张怡荪认为：“《老子》一书是老聃遗说的发挥，无产于战国嫌疑。老聃其人比孔子年长，是在孔子之先。《论语》中的“窃比于我老彭”，老即老子。又“以德报怨”，此文见于《老子》。张煦的这些论点，与马叙伦、唐兰、郭沫若、吕振羽、高亨和苏联学者杨兴顺等人研究《老子》的论点相同，成为研究《老子》第一派的重要成员之一。^③张煦的成名之作《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问题一案判决书》，已被收入《古史辨》一书中。^④张煦《老子考异录》一书，已被列入马叙伦编著的《老子核诂》所引用的书目中。由此可见张老早年研究《老子》所达到的水平。

一九二八年九月，张老应聘到清华大学执教，他到清华之前，任北京大学讲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但是来到清华，始为讲师，一九二九年升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在清华时，任《国文》和《文学专家研究》等课程。张老在清华大学执教期间，陈寅恪先生也在清华任教。陈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熟悉多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对佛教经典有精湛的研究，他家珍藏了不少国外出版的有关藏族历史、语言、辞书、佛学等方面藏文书籍。那时候张老家住城内沙滩，陈先生的家也在城内，他们到清华园去上课，要在西直门候车，等待清华大学的校车来接。在候车时，张老与陈寅恪先生经常互相切磋，谈论国外研究西藏学的情况。张老和陈寅恪先生过从甚密，在陈先生家里，张老开始接触到藏文资料。在这以后，他又阅读过不少国外研究藏学方面

的历史、语言、辞书、佛学等著作。对匈牙利人亚力山大·乔玛·居鲁斯一八三四年编成的《藏英字典》、德国人耶司克一八八一年编成的《藏英词典》，以及印度人萨罗特·旃陀罗·达斯一九〇二年编成的附有部分梵文对译的《藏英词典》等辞书，尤感兴趣，并潜心研究。当时国内研究西藏文化的人极少，出的东西不多，成绩平平。有清一代，编纂的民族语文辞书，如满蒙藏汉对照的《四体清文鉴》和《四体合璧文鉴》、满蒙回汉藏对照的《五体清文鉴》、梵藏满蒙汉对照的《五译集要》、梵藏满汉对照的《同文韵统》、满汉蒙藏托忒和回文对照的《西域同文志》等书，除《西域同文志》有简略的汉文解释而外，一般都是在词目下用对照的音译和义译，没有释文和例证，比起国外出版的藏外双语辞书，确实稍逊一筹。张老越深入钻研，内心越发感到不安。张老认为，西藏是我国的国土，西藏的学问应该由我们自己来研究。他因此矢志要改变这种状况，为国争光。他立志要首先编纂一部藏汉大辞典，用以沟通藏汉文化，奠定研究西藏学问的基础。

在旧社会，藏学是一个不起眼的冷门，十分艰苦，绝少有人问津。而张老以一个名牌大学中文系教授，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已不乏建树，却居然要改行从事西藏文化研究；在他进入中年的时候，要从头开始学习藏文，并达到能足以编纂藏文辞书的精通程度；为编出一部藏汉大辞典所必要的各种条件，更需要他去争取和创造。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在重重阻力面前，他不是退缩不前，而是迎着困难上。他首先得说服家庭和亲友的诸多劝阻；其次，一些闲言碎语，如“出风头罗！”“放着名牌大学中文系教授不当，改行另辟蹊径，这是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不可取也罗！”对于这些议论，张老不加辩驳，毫不动摇地坚决按照自己已经选定的道路走下去。

一九二八年冬，三十五岁的张怡荪教授在北京延聘喇嘛，拜

师求教，学习藏文；并约集愿意从事西藏文化研究的北大、清华的一批同事（主要是张老教过的学生），搜集资料，着手准备。他们先在北京圆恩寺，后又在雍和宫，租用了部分房屋，作为工作地址，以后又在成都创办了西陲文化院，作为研究西藏文化的专门机构。张老一面在清华大学执教，一面研究西藏文化。与此同时，张老又在 北京加入佛学研究团体，钻研佛教哲学。因为西藏文化深受佛教影响，研究西藏文化，不能撇开佛教哲学。这是由于汉地和藏地各自翻译佛经的重点和时代不同，不能把汉地佛学和藏地佛学等同起来。要揭开西藏文化宝库，就必须突破藏文和佛学这两关。为此，张怡荪教授四十年代还专门邀请藏族著名佛学大师、爱国老人喜饶嘉措，来成都西陲文化院主讲佛经，借以了解藏地佛学。

一九三二年秋，张怡荪教授离开清华大学，前去山东，接替闻一多先生，继任山东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张老在山东大学任教四年，直至一九三六年十月。他在山东大学开过《国文》、《音韵学》、《近体诗》、《先秦文》、《汉魏六朝文（代诸子学）》、《玉篇研究》、《毛诗》、《史部专业研究》、《文学家专集》等课程；著有《三国志集证原本》、《玉篇考订》、《玉篇原帙卷数部第叙说》，译有《西藏文法》。据张老教过的学生、诗人臧克家，于一九八一年撰写的回忆录《诗与生活》（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记载：“一九三二年，闻（一多）先生走了之后，张怡荪先生从北平来接任。他很精练，也颇活跃。讲曹操的时候，能把《三国志》关于这位英雄、诗人的传略背得出来，今天还清楚地记得他用爽朗声调背诵：‘沛国谯人也……’。张先生的藏文，当代首屈一指，听说此老尚健在，已经八十八岁了。”

张怡荪教授精力充沛，他在山东大学任教四年，开出九门课程，著有三项专著，一项译著，还要担任中国文学系系主任的职务，

但是他对于研究西藏文化，初衷不改，一点也没有放松。其时，搜集编纂藏汉大辞典的资料，极其困难，比如要找《大藏经》中藏文本的《大乘阿毗达磨集论》一书，张老曾托人两次上五台山；欲得一部《西域同文志》，张老是利用他自己兼任故宫管理委员之便，就故宫藏本晒蓝而来；为求一册英国人查理士·贝尔编著的《西藏语法会话》和一部德国人耶司克编纂的《藏英词典》，张老还得写信到伦敦，请托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的数学家张鼎铭先生帮忙购置。张老在这一段时间的收获是：他已从藏文本的《大乘阿毗达磨集论》中，收集到以佛学词汇为主的词目四千八百余条，对勘汉文本，按藏文字母顺序排列而编成了《藏汉集论词汇》，以及译出《西藏语法会话》中的会话部分，而编成了《藏汉语对勘》。张怡荪教授把这两本书编成之后，正值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伊始，抗日战争爆发。其时平津文字之禁甚严，张老携稿南行，入沪求印，及至上海，目击能铸藏字之上海南市遭日机轰炸毁矣！张老希望落空，悲叹不已，最后迫走香港，寄居逆旅，没有藏文字模，张老就动手亲自缮写。经数月努力，始将这两本书稿缮写完毕，后由大东书局香港印刷厂石印成书。艰苦备尝，可想而知。

一九三八年，张怡荪教授来到成都，他在成都创办了一所西陲文化院。这所文化院是私立的，文化院的研究方针，与国民党教育部的意图不合，一直得不到备案承认，经费全靠自己筹措。那时文化院研究人员的生活委实清苦，薪俸微薄，仅能果腹；文化院的院址，一迁再迁，数易其地。但是这些都没有动摇他们研究西藏文化的意志。为解决西陲文化院的经费问题，摆脱困境，张怡荪教授出任西康省通志馆总纂职务，在他就任通志馆总纂期间，聘请西陲文化院部分研究人员担任编纂，采取包工的办法，承包几个志，如《西藏医方志》、《西藏寺庙志》等，让文化院的研究人员承担，以此来维持西陲文化院的“寿命”。在这段时间里，

张老编成了《藏文书牒轨范》、《汉藏语汇》、《藏汉译名大辞汇》和《西康省分县地图集》等，并由西陲文化院印刷出版。这些辞书的编成，都是为以后编纂《藏汉大辞典》奠基的。后来，张怡荪教授继续从《杂集论》、《瑜伽师地论》、《俱舍论》等藏汉文本佛书里收集词汇、短语，并参考国外资料和藏外双语词典，于一九四五年汇编为一部《藏汉大辞典资料本》，分装十大册。这是建国前全国藏汉辞书中资料最为丰富的一部稿本。

编纂一部大型辞书，长年累月，难见功效，是所谓“‘智者’所不为也”的。这十大稿本的写成，也真是张怡荪教授以一股“傻劲”干出来的。张怡荪教授最初立志要编纂这部《藏汉大辞典》，就完全是出于赤诚的爱国心和强烈的事业心。他的决心和气魄，是值得称道的；他艰苦的创业精神，值得人们敬仰和学习。

张怡荪教授研究西藏文化，成绩卓著。建国初期，我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需要了解有关藏区方面的知识，不少领导人，如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等人，前来成都焦家巷三十六号张怡荪教授寓所，向他求教，询问有关西藏学问，张老都一一作出回答。张老并将他著的《西康省分县地图集》，以及《藏汉语对勘》和《汉藏语汇》等书，赠送给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这些图书对于开辟西康工作和进军西藏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张怡荪教授心情十分舒畅。五十年代初期，他被聘任为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川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并受命继续编纂《藏汉大辞典》。张教授聘请成都佛学界知名人士女大法师隆莲等人来川大文科研究所参加工作，对《藏汉大辞典资料本》作了某些修改，增加了一些汉文注释。但因当时无法聘请到藏族学者，条件还不具备，这一工作未能进行下去。这三年内还是有所收获，那就是编出的《藏汉大辞典样本》，得到中国科学院的承认和较好的评价。中国科学院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七日以

“(53) 人民发字第0963号”文件，对《藏汉大辞典样本》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本书网罗众家，采摭颇富。且往往刊改前人漏失，亦非徒事抄撮者可拟。”当时国内学习藏语文的人日益增多，迫切需要一部比较完备的藏文辞典。中国科学院一九五六年准备出这部《藏汉大辞典》，但是主编张怡荪教授认为，大辞典还不成熟，不愿在那时出版。及至一九五八年，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派遣张怡荪教授，率领《藏汉大辞典》编纂组，前往拉萨，搜集资料，进行编纂。这时，张教授已届六十五岁高龄，途经西安时，西藏一位负责同志担心他年纪大了，难以适应高寒地区缺氧的恶劣气候，执意劝他返回成都。张怡荪教授却说：“感谢党对我的关怀，但编成大辞典是我多年来的宿愿。此次受科学院之命，一定要去拉萨，完成大辞典的编纂任务。”几经磋商，最后这位负责同志让他到拉萨去了。西藏地区给编纂大辞典提供了有利条件：过去不易见到的资料都得到了，不易找到的藏族学者，如洛桑土旺、罗桑多杰、钦饶威色等人，也请来了。这就给大辞典进一步充实内容和提高质量带来了希望。于是张怡荪教授与副主编祝维翰先生商议，决定重新拟订计划，编制整编方案，打破原大辞典资料本的规模，扩大收词范围，强调从藏文原著中系统地收集资料；到民间去作实地调查采访，搜集活语言；同时也从清代噶厦^⑤、益仓^⑥的公文档案中，收集旧时的官厅术语。为了使更多的藏、汉族读者，都能使用这部辞典，在体例方面作了大的改动，决定变原藏汉对照为藏汉双解，使这部辞书成为综合性质的藏汉双解大辞典。

张怡荪教授治学谨严，对大辞典的每个词目，他都要认真审读，反复思考，多次修改。他常说：“编纂辞书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辞典，就是辞的典范；辞典，就是不说话的老师，要为读者释难解惑。词目的释文，要给人以简明、确切、具体而全面的概念。我们辞典编纂人员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工作。”

张怡荪教授历来重视民族团结，对共事的藏族学者十分尊重，并能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专长。他常说：“没有藏、汉专家的紧密合作，《藏汉大辞典》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因此可以说，这部大辞典的编成，是在党的亲切关怀下，藏、汉两大民族团结协作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张怡荪教授在拉萨，一住四年，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他的心情是愉快的。这四年中为大辞典收集了丰富的资料，进行初编，获得词目八万余条，并广泛征求了藏族学者、著名诗人江金·索朗杰布等人的意见。拉萨工作告一段落后，张怡荪教授又继续邀请藏族学者洛桑土旺等人，与编纂组其他同志一道，于一九六二年六月回到成都，正式着手编纂大辞典。一九六四年一月，张怡荪教授和副主编祝维翰，将编好的书稿，送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和北京同行专家学者审查。文化部胡愈之副部长、民委会萨空了、丹彤副主任，先后两次与张、祝谈话。文化部和国家民委会还为此成立了接待小组，负责与大辞典编纂人员交换意见。接待小组组织三次会议，邀请民族出版社、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等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对《藏汉大辞典》第一、第二两卷稿本，进行座谈审查。国家民委会后来发文（发文〔64〕民文丹字第076号）的《关于藏汉大辞典》出版问题座谈纪要》，对大辞典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藏汉大辞典》收词相当丰富，解释比较详细。它已经超过了现有藏文辞典的水平。《藏汉大辞典》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除了收集藏文旧籍中的书面语以外，还注意收集了建国后的新词术语，特别是经过实地调查采访，收集了不少藏族民间有关农牧业、手工业等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方面的语汇，资料比较丰富，有出版价值。《藏汉大辞典》可以作为阅读藏族文言文书籍的工具书，对藏语规范化，也会起一定影响。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充实、修订，提高质量后，可以供当前国内研究藏族历史、文化、档案、宗教和语言的人使用，同时在国

际上也会有一定的政治、学术影响。”国家民委会还拨付经费五万元，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试印本一千部。

张怡荪教授在北京受到隆重的礼遇，心情舒畅，精神振奋。他从北京回到成都后，立即组织大辞典编纂人员，按照《座谈纪要》的精神，进行修订，并如期将书稿送到北京。可是，十年动乱，竟在一夜之间，变这部大辞典为“大毒草”，大肆批判。张怡荪教授也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关进“牛棚”。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他的思想极为苦闷。但是，张老深信这件工作对国家对人民是有益的，灾难终必消除。一九七七年年底，张怡荪教授给邓小平同志和方毅同志写信，提出恢复《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的要求。邓小平同志、方毅同志和乌兰夫同志亲自作了批示。根据这一批示，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出版局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关于恢复《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的会议，并于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向四川省委等有关省、市、自治区下达了正式公文（发文统字第045号）。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乌兰夫同志在民族文化宫接见了前来北京汇报恢复大辞典编纂工作筹备情况的四川省民委主任扎西泽仁，乌兰夫同志要扎西泽仁等同志转达他对张先生的问候，感谢张先生为藏汉人民做了一件大事。同年五月十七日，国家民委和国家出版局在成都联合召开的《藏汉大辞典》座谈会上，萨空了同志和许力以同志分别代表国家民委和国家出版局，向五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从事藏汉大辞典编纂工作的张怡荪先生表示感谢和敬意。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张教授如此崇高的荣誉，这对张怡荪教授晚年是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十年浩劫中被迫停顿长达十二年之久的《藏汉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于一九七八年五月，终于重新上马。一九七九年二月，就出版了《藏汉大辞典》征求意见稿（三卷本）。这时，张怡荪教授已届八十五岁高龄，但他精神矍铄，仍亲自抓编纂工作，不时过问编务。他针对着初稿的薄弱环节，如佛学、因明、医药、

历算等，不失时机地组织编纂人员，进行重点补充和修订。因为过去受极“左”思潮影响，佛学词目被大加削减，词目只能藏汉对照，下面不能作出注释。这对发掘西藏文化宝库，是一极大的缺憾。此次恢复辞典编纂工作以后，是把佛学词汇作为百科词汇的重点，系统地进行了较多的收集。每条佛学词目的下面，都有比较详细的藏汉文解释，比征求意见稿前进了很大一步。辞典中的因明学词目、历算学词目、医药学词目、乃至历史学、地理学词目的下面，都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藏汉文解释；补全了语词部分的藏汉文注释，及其例词、例句，此外，还新增了三千多条词目。经过这五年卓有成效的工作，辞典内容更加丰富，质量也有较大的提高，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张怡荪教授献身藏学五十余年，殚精竭虑编纂《藏汉大辞典》，为藏汉人民做了一件大事。正当《藏汉大辞典》于一九八三年七月在北京发排付印之际，张老于同年九月一日在成都不幸病故了，享年九十岁。他未及亲见为之辛苦一生的《藏汉大辞典》的正式出版，令人十分惋惜。对于张怡荪教授在接近古稀之年奋不顾身率队去拉萨一事，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曾经参加过这部大辞典编纂工作的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四川省尼众佛学院院长女大法师隆莲，十分敬佩。她向笔者吟诗一首，悼念张怡荪教授。她的诗是：

逻娑^⑦远读会盟文^⑧，艳说搜奇郭景纯^⑨。

惆怅曲终人不见，鸿篇高映雪山^⑩曛。

张怡荪教授主编的这部《藏汉大辞典》，于一九八五年七月在北京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问世以来，在社会上博得好评。出版不到半年，书店就销售一空。民族出版社于一九八六年十月，又重印了一万部。象这样有近四百万字、二百零七个印张、正文三千二百九十四页、有《辞海》或《辞源》三分之二大小篇幅的大型辞书，发行不久就重印，这在我国少数民族文

字图书中是少见的。

《藏汉大辞典》三次被选参加书展，即参加香港中国书展、全国图书展览和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藏汉大辞典》两次获奖，即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七日获得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全省第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又获得“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一等奖。中宣部出版局局长许力以，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在《人民日报》第三版上撰文，题目是《出版工作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该文提到：“新近出版的《藏汉大辞典》，洋洋大观，收词五万三千条，对世界具有影响，这是少数民族出版事业为我国和世界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

《藏汉大辞典》的出版，结束了被国际上奉为权威辞书的达斯《藏英词典》八十三年来的领先地位，被誉为藏族文化史上的壮举^⑩。一九〇二年，印度人萨罗特·旃陀罗·达斯编成附有部分梵文对译的《藏英词典》，问世以来，风行全世界，一直处于藏文辞书的领先地位，它的缩印本一九八三年还在日本第六次印刷。近年来国内外出版了不少藏文辞书，但就内容来说，多数属于语文方面的中、小型藏文辞典，都比不上达斯词典。这部《藏汉大辞典》，无论就藏族文化的开拓面、资料收集的系统性、实地调查采访所得的活语言、内容的丰富、释文的详细、确切，例词例句的普遍，以及体例的改进方面，都远远超过达斯《藏英词典》，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争得了荣誉。

张怡荪教授虽已谢世，但他为国争光的爱国初衷已经实现。如果他在天之灵得知今天《藏汉大辞典》在社会上博得的好评和享有的盛誉，他将含笑于九泉。行文至此，笔者深有感触，特赋诗一首，聊表缅怀悼念之忱。我的诗是：

大师共冀寿期颐，松柏谁教冰雪摧。
喜看辞典传中外，藏汉沟通奠伟基。

注：

①《晨报》：初名《晨钟报》，1916至1928年在北京出版。

②郑伯麒《六十年前学术界的一段佳话》，《百科知识》1983年第12期。

③见任继愈译著《老子新译》绪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3月第2次印刷。

④见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四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

⑤噶厦：藏语音译，指原西藏地方政府，清乾隆十六年设置，1959年3月，国务院明令解散。

⑥益仓：藏语音译，指原西藏地方政府处理宗教事务的专职机关，范围较噶厦为小，而不相隶属，直接对达赖或摄政负责办事，噶厦之一切政务公文，非经益仓审核不得上行下达，这是为了削弱和牵制噶厦的权力而设置的，存有大量旧时公文。

⑦逻娑：拉萨古名，一作逻些。

⑧会盟文：即唐蕃会盟碑盟文。唐长庆三年，吐蕃赞普可黎可足建于今拉萨大昭寺前的会盟碑。碑上用藏、汉两种文字铭刻了唐蕃会盟的全文。

⑨郭景纯：即郭璞。东晋文学家、训诂学家，集《尔雅》学大成的大学者。在这首诗里，隆莲法师将张怡荪教授比作郭璞。

⑩雪山：泛指西藏。西藏地势高峻，大部地区，终年积雪，故有雪山之称。

⑪见《吴玉章奖金获奖著作简介》对《藏汉大辞典》的评语，《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

作者工作单位：成都科技大学外文系